

以独特艺术 书写军魂

□王美春

王耀东的新乡土诗享誉海内外,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著名诗人,而其早期创作的军旅诗则让他具有了“诗人”之资格。其军旅诗创作于他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军期间。近二十载的军营生活给了王耀东创作的灵感,他的军旅诗继承了中国古代军旅诗(边塞诗)的传统,而具有时代特征与艺术特色,往往借助于新巧的构思、恰当的设色、形象的语言等书写军魂。军人独特的感受,军人的豪迈情怀,军人的责任感等,构成了军魂的重心。

一、善于以新巧的构思表现思想内容

王耀东在创作军旅诗时,注重构思的新颖巧妙:首先做到有感而发,也即对彼时彼地军营的生活“有独特感受”,然后再对创作素材“进行巧妙的艺术加工”,并能“从新颖的角度去表现思想内容”。(以上引文出自尹在勤《新诗漫谈》)因此,其笔下的军营生活饶有特色,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王耀东诗文选》第一卷精选了王耀东的军旅诗三十余首(以下引用的其军旅诗皆出于此卷)。《心愿》一诗,仅有三节十二行,却显示了构思的巧妙。全诗围绕“我的刺刀”和“我的心愿”来构思。首先,将“亮亮闪闪”的“刺刀”比喻为“一面心灵的镜子”,为此“我一天擦你几遍”。切入角度颇为新颖。接着,逆转,写“我”对“刺刀”言“你未必了解我的心愿/我要从你身上/看到彩霞满天”。“刺刀”本无知觉,谈不上“未必了解我的心愿”,诗中言其“未必了解”,实为以此衬托、突出“我的心愿”。这也就显示了构思的新巧。最后,设想“如果有一天/刺刀进了博物馆/印在你身上的指印呵/是我最终的誓言”。此设想新颖别致,通过新巧的构思,艺术地表现了诗的思想内容,生动地表达了一个军人独特的感受,期盼“彩霞满天”(象征祖国繁荣富强)的感人的“心愿”。这方面的佳作还有《每当我巡逻海边》《通往哨所的路》等。

二、善于设色反映军人豪迈的情怀

学者霍松林曾如此阐述诗的设色:“大千世界、千汇万状、形形色色,诗人运用色彩,不能满足于简单地‘随类赋彩,以色貌色’,而应该精心选择、着意调配,构成和谐、生动的画面。这就叫设色。”这颇有见地。以此衡量王耀东的军旅诗,我们更可发觉其善于设色之特色。王耀东的军旅诗在设色上突出表现为“精心选择”多种色彩,而且“着意调配”,使之浑然一体,“构成和谐、生动的画面”,并能紧扣军人所处环境之特征,有助于反映军人豪迈的情怀。《了望台》的开头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青的山,绿的海,装在战士胸怀;白的云,淡的烟,都在脚下踩。”这里,精心选取了“青”“绿”“白”等多种色彩,“着意调配”,使之与“山”“海”“云”等物象浑然一体,并借助于动词“装”“踩”,使之与“战士的胸怀”“脚”有机结合,构成了和谐、生动的画面,别具一格的意象组合,也就紧扣了军人所处环境之特征,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代军人宽阔的胸襟、豪迈的情怀。如此设色,巧妙自然。除此之外,《战士的脚步》与《云琴》(《哨位上的歌》二首之二)等诗也都是善于设色反映军人豪迈情怀之佳作。

三、善于以形象的语言表达军人的责任感

军人都具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感,这在王耀东的军旅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军旅诗在表达这种责任感时不是运用“标语式”“口号式”的语言,而是采用了形象生动、富有个性的语言,因而饶有诗情,也富有诗意。《枪杆诗抄》(五首)中的第一首诗《峭壁》:“哨兵的刺刀,是最陡最陡的峭壁,再狡猾的敌人,也休想飞越!”以“最陡最陡的峭壁”比喻“哨兵的刺刀”,新颖别致,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军人不放走一个敌人的责任感,富有诗情诗意。第五首诗《准星》:“准星,准星,什么是你的标准?在我的枪口下,不放走一个敌人!”此诗与第一首诗同是表达军人不放走一个敌人的责任感,但二者在写法上明显不同。第一首诗采用的是巧比妙喻,而此诗则是将枪的“准星”人格化,并妙用设问之法,也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军人不放走一个敌人的责任感,同样富有诗情诗意。

467

当一个人有求于你而被你拒绝的时候,最可见其人品。

468

对于过往的文化人物,尤其是研究传统学问的前辈,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仰之弥高,总觉得他们读书比我们多得多,乃至有“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话。

其实论读书的条件,前人当然是远不及我们的。过去没有这么普遍的照明,更不可能一机在手随时随地地阅读,前人读书的便利自然比不上我们。前人得书不易,那是不

消说的,即便能坐拥书城,但线装书读起来总要费劲些,不论书的排版、字体,还是书的分章、分段、句逗,都不如洋装书这么明朗。可以肯定,前人读书的效率要比我们低,速度要比我们慢。

当然,古人确可能比我们勤奋——他们没有这么多传播方式,没有这么多娱乐节目,自然更容易心无旁骛地读书呀。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古人身处古代(这是废话,但又不是废话),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书需要读,应该说,他们压根儿对现代学问一无所知,他们只需要读“国学”著作就够了!那么,对于古书,对于古典的学问,他们要比我们熟悉,岂不是当然的吗?设使古人身处当

代,他们还能成为“国学大师”吗?

469

对于记录历史,有些人太不在乎。他们曾有特殊的经历,见识过重要的人与事,却没有为天下后世留下一点回忆,任由青史成灰,做了他们的殉葬品,“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

另一方面,对于历史记录,有些人又太过在乎。历史的世界本来无比广阔,他们却只会反复咀嚼那些已被无数人咀嚼过的史料,为那些史料作注脚,为注脚作注脚,为注脚的注脚做注脚,以无比严谨的方式做无足轻重的工作,“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

“真力弥满， 老人固未老也。”

——钱锺书与
忘年交陈衍交往补遗(一)

□钱之俊

有关钱锺书与民国诗坛大佬、“同光体”大诗人陈衍忘年交之史实,钱锺书《石语》、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等已有描述。近来,钱锺书1933年10月25日到1934年2月28日间,在光华大学任教及第一个寒假时的日记(《起居注》十四)被发现披露(未正式出版或发表),又有一些钱锺书与陈衍交往的一手信息浮出水面,弥足珍贵。

钱锺书得识陈衍,是在清华读书时候,和其父亲钱基博有关。1931年,陈衍南下无锡国专任教,时钱基博已在国专兼职四年余,二人始为同事。“先生(钱基博)始与之订交,此后同事七年,谈诗论文,相契极洽。”(傅宏星《钱基博年谱》,第10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二人相互抬举彼此诗文,关系极好。时钱锺书正就读清华,亦始与陈衍交往。钱基博去拜访陈衍时,又是赠书,又是“吹嘘”自己的儿子,于是,陈衍写了首诗《子泉赠所著书甚夥谢以长句兼诒哲嗣锺书》(载《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24期):

吴越王孙旧世家,等身著作薄才华。却沿东海人谈艺,狠使西江派拜嘉。(日本博士铃木虎雄推余诗为江西派,君亦云尔,实不然也。)跋扈名场年少事,抗颜文酒老来嗟。不羁马忆涪翁语,雏凤清声异域夸。

从此,钱锺书与陈石遗始有诗信往来,常得其指教。这期间,我们知道的钱陈交往重要细节也不少,如:1932年3月26日,《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刊钱锺书诗《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二十一年阴历除夕”,1933年1月25日(此前部分著作换算错误),钱锺书陪陈衍在苏州胭脂桥寓所守夜度岁,正《石语》所记也。1933年早春,钱锺书在清华还有半学期,他将中学毕业后1930年春至1932年冬所写的诗,编成一集,即《中书君诗》。但这本诗集并未付印,而是“手抄自订本”,“呵冻写与季康”。“这是他最早的诗集。”(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这是专门送给女朋友的。这本诗集他是准备正式印制的。为给诗集增重,他特请陈衍作序:“来海上前亦有诗数十首,写定乞石遗诗老为序”。(这是钱锺书在其后印制的《中书君诗初刊》跋语中所言)《石语》附录:“二十一年春,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疑为“二十二年春”。该诗集1933年12月钱锺书又重新写定送给杨季康。陈衍的序也一直未用过。)”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诸如此类,皆显示二人忘年关系之非同一般。

1933年6月,钱锺书清华毕业,到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任教。就在这一年寒假期间(1934年1月14日至2月23日),也是钱锺书上班后第一个寒假,日记中几次出现了陈衍,皆为新材料。

1934年1月寒假前的元旦日,1月1日,钱锺书给陈石遗写了封信(《上石遗文书》),表达“想慕”之情,自负逞才,介绍“新妇”,极为自得。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九二



新书快递

一日三秋

刘震云著
花城出版社

小说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以想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叔生前所画的画作,探讨天津人幽默的本质。从两米见方的剧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陈长杰、李延生、樱桃,围绕几位主人公身边出现的人物,有开车的、扫大街的、开饭馆的,串联起几个家庭的人生经历和故事,把被世人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复刻出来。后引出寻常父子二人遍尝生活辛酸后对人生至理的了悟,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悟出:一个重要的瞬间,在人生中犹如一日三秋,但这瞬间永不再来。

“红星”

[日]石川祯浩著 袁广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前半部分从1937年日本政府公报登载的一幅错误的“毛泽东”照片入手,追寻外界逐渐认识中国革命领袖的历史过程,以及其间所发生的误解、巧合与蓄意隐瞒。后半部分则致力于复原《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过程与版本流变,详细梳理了它在中国、苏联、日本等地的历史命运,澄清了后世对于这一名著的诸多误解与不实指控。

我还记得

亦邻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的妈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前“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变成了一个被剥离了记忆、情感和正常认知能力的懵懂老人。作为一名插画师,亦邻试图用绘画帮妈妈抵御遗忘、留存记忆。看到妈妈被画里以前的场景唤起回忆,开口说出“我还记得”,亦邻深受触动,于是坚持每天给妈妈画一幅画,画爸爸妈妈相亲相爱的时光,画三姐妹小时候的故事,画妈妈曾经的理想……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美]白德瑞著 尤陈俊、赖骏楠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刻画了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和书吏们生动形象。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作者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探讨吏役在维系帝国统治与基层社会运行中的“合理性”,从而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这些人物在清代县衙当中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并思考其活动是如何影响到清代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